我的老师陈达教授

○刘绪贻（1940社会）

陈达教授

陈达教授(1892—1975)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，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十余年，解放前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他在美国留学期间，跟随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（W.F.Ogban）等研习社会学。1923年，获得该校博士学位。

学习社会学的人一般都知道，社会学起源于欧洲，但是传到美国后，为时不久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的声望便超越了欧洲，其主要原因，乃是欧洲此前社会学偏于理论研究，而美国的社会学偏于实证研究。当然，按照社会学创始人孔德（Auguste Comte）的说法，实证精神不仅是经验的验证，也包括理论的验证。但此前欧洲社会学研究偏重理论的验证，传到美国后则两者兼而有之，而且强调经验的验证。

陈达深受美国这种社会学主流研究法的影响，平生非常重视实证研究。他的博士论文《华侨——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》，就是他对美国华侨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。这篇论文通过后，立即受到美国出版界重视，同年出版了英文版。1923年回国后，他到清华学校任教。从该年起，一直到1952年，在这29年中，他亲自主持或参与了24次社会调查工作，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，在云南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研究工作。他的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国劳工问题》（1929）、《人口问题》（1934）、《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》（1938）、《南洋华侨之福建、广东社会》（1939年日文版）、《华南侨乡》（1940年英文版）和《现代中国人口》（1946年英文版）。陈先生的这些著作，材料丰富，不事空谈，完全用事实说话，深受中外学者重视，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。

我虽然只选读了陈先生的“人口问题”课程，但却读了他的三大名著：《人口问题》、《中国劳工问题》和《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》。陈先生之为人和他的教学方法，与他的为学有些相似。他平时不苟言笑，衣履整洁朴素，讲究严谨踏实，不够灵活，缺乏亲和力。他上课时正襟危坐，按照事前准备的提纲，字斟句酌地讲，显得枯燥而无风趣。对他的这种教学法，同学们在课外有些闲言碎语，不知他是否有所耳闻。在上学期最后一课时，他

郑重地问同学们对他讲课有何意见。由于陈先生名气大，日常态度严肃，大家平时虽有意见，但这时却噤若寒蝉。沉静了一会儿，我禁不住说："陈先生这种讲课法，我曾琢磨过。我们每星期上课3次，共6小时；从宿舍到教室往返1次1小时，3次共3小时；上课加往返，每星期总共要花9小时。每学期如以18星期计算，共为162小时。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几小时或1天便可仔细阅读完毕，剩下的时间可以读别的书，不更好吗？"陈先生听了后，从他的脸色变化来看，是很生气的。但他克制着自己，没大发脾气，只是说："照你这种说法，那么办大学便没什么必要了。"我说："的确，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。我曾问过潘先生、吴先生，他们也未给我满意的答复。"他说："恐怕比潘先生、吴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。"后来我想，陈先生是可以说出办大学的作用的，只是当时在气头上，一时语促，所以没有正面作答。

下课以后，我后悔言词过激，伤了陈先生感情。同学们则为我捏一把汗，担心我今后学习中会遇到困难。我虽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深有素养的大学者，即使一时生气，但决不会长期放在心里。不过，我心里也不能说毫无芥蒂。然而，以后的事实证明，陈先生毕竟是一个胸襟旷达的大学者。他先是给我的课程论文打了95分，学年考试成绩也列全班之冠。由他指导的我的学士论文，也得了95分。而且毕业后，他还留我在他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；当我因故要去重庆工作时，他又给我写介绍信，将我推荐给经济部属的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。194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，陈先生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作《现代中国人口》（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）讲演。主持演讲会的是我的导师威廉·奥格本，也就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。当他从奥格本那里知道我的"高等代数"和"高级统计学"两门课程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时，他托人转告我，希望我专攻社会统计学，将来回清华任教。后来，我因对文化人类学、知识社会学更感兴趣，辜负了他的期望，但他的这种度量和他对学生的关心，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。

除胸襟旷达外，陈先生还有些事可记。反右时，陈先生因学术观点被错划为

1936年秋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于礼堂前。前排右第三人起：潘光旦、陈达、李景汉

右派。但据清华社会学系校友王胜泉回忆，反右后有一年他去陈先生家拜年，谈话中涉及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，陈先生十分肯定地对他说："中国人口太多，就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负担，绝不会因为人多就力量大。中国人口规模非得控制不可。"王胜泉校友当时听到这些话大吃一惊。因为"人多力量大"是毛泽东的话，陈先生的这些话当时是被看作"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"的，反右时他的这种观点便被痛批过。然而为了坚持真理，他还是要说，足见他的骨气。另外，陈先生也不是不注意生活情趣的人。他非常喜欢打猎，而且猎技高超。有一次，一枪打下两只山鸡，每次向人谈起，总不禁笑逐颜开。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问安，他招待我喝的茶充满玫瑰花香。

（摘自《箫声剑影——刘绪贻口述自传》，南宁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5月）

李济——失踪的大师

○施雨华

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，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。在半个世纪里，这位"中国考古学之父"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。他一生从事考古，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"中国人的始源"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的名字在大陆销声匿迹……

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，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。就在这一年，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学术机构"中央研究院"，他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。

10年之前，他由清华学校选送留学美国，5年里拿了3个学位：心理学学士、社会学硕士，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——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。有人自此习惯性地称他为"Dr. Li"。据说他父亲有一阵还给自己起了别号"博父"，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，有炫耀儿子的意思，更显示老父的尊严。

1923年回国后，他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。之后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，

1925年冬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合影，前排左起：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；后排左起：章昭煌、赵万里、梁廷灿（时陈寅恪未到校）